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17年7月12日

第370期

13



谈谈江西师大图书馆古籍书库的两部书

■刘世南 曹红东

习总书记重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号召大家努力继承与发扬。我们江西师大图书馆古籍书库正是传统文化的渊藪之一。因为承继了前身国立中正大学的馆藏,仅线装古籍就有六万余册。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现择其一来作一对比。

我们认为含有较多精华的是蒋瑞藻主编的《新古文辞类纂稿本》,而几乎全是糟粕的则是《国民代表推戴书》。

自姚鼐《古文辞类纂》出,一般只知道有王先谦和黎庶昌的《续文辞类纂》,很少人注意到蒋瑞藻这部书。其实它选的都是近代名家的古文,实有一定之水准。现在,我们特挑出如下二十六篇,略作介绍。

卷一 薛福成《再论俄罗斯

立国之势

卷四 严复《辟韩》

丁惠康《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说》

蒋智由《亟解日约论》

卷五 薛福成《日本国志序》

卷七 吴汝纶《天演论序》

卷八 黄遵宪《日本国志序》

《日本食货志序》《日本取官志序》

《日本刑法志序》《日本学术志序》

卷十一 康有为《日本杂事诗序》、《欧洲十一国旅游记序》

严复《政治讲义》《英文汉语序》《天演论序》《群学肄言序》《群己权界论序》

卷十五 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欧洲战役史论自序一》《欧洲战役史论自序二》

卷四十五 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

卷四十八 孙诒让《记瑞平化学学堂续记》

卷五十一 林纾《尊疑译书图记》

卷五十二 张寒《南通师范学校始建记》

下面,我们选几篇加以点评:

一、薛福成《再论俄罗斯立国之势》。此文指出:“俄之为国,地

广人稀,冰雪坚互,粮无可因,城无可据,得其地不能守,得其人不能用,故诸国不窥俄则已,窥之未有不败者。而俄则因利乘便,恢拓疆土,方无虚日,此欧洲诸国所以慄慄危惧也。”最可惊的是作者的预见性:“或曰:俄之凶党,蕴其毒孽,朋党异志,冀革旧政。俄皇权力虽重,日夜虑炸药飞弹之祸,可谓至危。俄民亦以所享权利,不能与英、美、法、德诸国齐民齿,茶然丧其乐生之心,尚何能日加强盛哉?答之曰:余所论者国势也,非国政也。俄之国政,渐久亦必改变,与英、法、德诸国相同。”后来的历史事实,尽管吊诡多变,而大体不出所料。能说前人不及今人吗?而这种文章在清末变法图强之日,对一般士大夫,不正振奋发聩吗?

二、严复《辟韩》。此文指出“民之自由,天之所界也。”此即西方“天赋人权”说。他指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此承庄周、唐甄之言,故曰“所谓””。底下痛快地揭露:“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十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我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

笔者刘世南30多年前在古籍阅览室就认真读过此书,并在日记中作了评语:“今日读之,犹血脉偾张,而御用学者犹日造谎言以卫其权贵阶层之利益,真万死不足以蔽其幸也!”

三、蒋智由《亟解日约论》。此文指出:一战时,中、日签订军事条约,日本根据条约,“以操军武之权,而制吾中国之死命。”但“日之欲统东亚,擅中国,此欧美之所一力而必不容者。日也挟其一方而来,欧美必挟其一方以晋(进),以一羊(指中国)为之食,而构两虎之斗,则祸又莫大乎争是约者也。故曰军约者,中国之亡症也,东亚之乱原也,胡为乎莫之除?除之,此其时矣!”最后警告说:“夫土耳其以军事之权授之德人者也,今则亡,则中国可不援以为戒乎?”世南始终认为日本是中国的大患,以95岁的阅历,深知国际关系中没有什么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民族利益。对付日本,只有自强不族。

四、黄遵宪《日本国志序》。作者自言:“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九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谊,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一衣带水,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希望当世士大夫能留心时务,力图自强,巧日本那样向西方学习。

以下《日本食货志序》,介绍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经济发展史,其次序为“审户口”“核租税”“筹国计”“考国债”“权货币”“稽商务”。“六者兼得,则理财之道得而国富矣。”《日本职业志序》认为欧美先进国家“设官繁”“赋敛重”,颇同中国《周礼》,“而其国号称平治者,盖举一国之财,治一国之事,仍散之一国之民。故上无匮乏,国无废政,而民亦无游手。”日本维新之后,设官多仿泰西。所以,作者撰者此志,以供中国变法之参考。其作《日本刑法志》,是因为作者先居日本,后居美国,知道“泰西人好论权利”(即公权力与人权)。“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欧美大小诸国,无论君主、君民共

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国而已矣。”世南当年看后,不胜感慨,在日记中记曰:“强调法治而非人治,人有权限,无抑无纵。国人则迄今尚多不知有人权。”

作者之作《日本学术志》尤其有意思,他既看到民主政治的优点,如人人有民权,提倡博爱,科学发达,“拜爵叙官,皆以公选。其君臣上下,无疾苦不达之隐,无壅遏不宣之情。”又指出其流弊:“君民同权、父子同权;”“父母兄弟,同于路人。”如此,“必至于极分裂极残暴而后已。”“必有欲行均贫富均贵贱均劳逸之说者。”他的结论是,“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当其乱,则视君如弈棋,视亲如赘疣。而每交一锋,蔓延数十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更有视人命如草芥者。岂人性殊哉?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一战二战以迄今的全球史实,充分证明了黄遵宪的预言,今天不是西方也有学者在呼吁,要用“东方的文明”来拯救西方高科技所酿造的危机吗?

五、严复《天演论序》,介绍内篇(今译“演绎”)之术和外篇(今译“归纳”)之术,奈端(今译“牛顿”)的力学定律,斯宾塞的社会学,目的是使中国人知道如何自强保种。《群学肄言序》指出,“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厚生之事,操其本尔。”即今之政治经济学。《群学肄言序》指出,穆勒此书认为,“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耳。”也就是说,所有社会公民,其个人自由必须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前提。

经过以上选择性地点评,可见蒋瑞藻这部《新古文辞类纂稿本》确实很新,对我们今天仍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如民主与法治这些历史任务,亟待我们去完成,才能真正使中国在21世纪崛起。

中国由先秦的封建社会演变为由秦迄清的皇权专制社会,“官本位”观念流毒极烈。为了惩前毖后,我们不妨展示一下这部《国民

代表推戴书》。

此书既无编者姓名,也无出版单位、出版时间,更没有定价,估计是筹安会印制的内部刊物,不可能也不需要公开出版。

开篇就是“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单”,总计1993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国体。

先看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奏,所有推戴书“均据称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历数其一“清帝不得已而逊位,皇天景命始集于我圣主,我圣主弗居也。”其二“南京政府不得已而解散。”其三“大难既平,全国统一,我圣主仍有弗居。”其四直到推举袁为大总统,他才接受。

“然共和国体,不适国情,上无以建保世滋大之宏规,下无以谋长治久安之乐利。盖惟民心有所舍也,则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则必有所归。今者天崩民夷,全国一心,以建立帝国,民归盛德;又全国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华文明礼义,为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神武,为亿万姓归心之元首。伏愿仰承帝眷,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轩帝神明之胃,宜建极以承天;皇后继及之规,实抚民而长世。谨奏。”

看到这种充满腐朽气息的陈词滥调,我们不由感慨万分!在那班冬烘头脑看来,这种高高皇皇的驷四偶六的奏疏,真是华国文章。而实质呢?只是利禄的诱惑,权势的胁迫,和真正的民意毫不相干。起草者和签名者,固然有起过武夫,但也确多硕学通儒。其中如江西新建县人杨增举,世南早知其人。杨增举,晚清进士(1860—1933)字均谷,号松阳山人,新建县人。光绪年间进士,先后为刑部主事,热河理刑司员,四川候补知府,广东署法院参事。民国初年,为国史馆协修,交通部推事。平生谨伤自守,潜心于学,晚年沉潜佛典。早年在京师即有诗名,学王维之高秀,自居易之平易,苏东坡之旷逸,

显示,而是更注重对历史和命运的静静观照,注重理解与尊重,倾向同情与怀念”(第59页)。我们可将之称谓“观照式的主题呈现方式”。实富有中国古典小说韵味的词汇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风格进行概括,创作观念的突破性转变,归纳和总结其呈现出的新的审美方式和审美价值。”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所谓“对短篇小说纵横比较的考察”包括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从纵”的方面,作者将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放在近现代以来中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比较,发现新时期短篇小说在主题呈现、技术转型、叙事模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特点;其二,“从横”的方面,作者将新时期短篇小说与同时期的长、中篇小说进行比较,发现其在体裁观念、语体特征和文体风格等方面的独特性,揭示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实验性和探索性特点。此外还可发现,作者甚至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进行比较,发现前者所具有的“中国”特点。例如,在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风格的生成与突破的分析中,作者将其风格呈现归纳为“纯净”“精致”“潜细”“绵远”四个方面,力求将其之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呈现的审美风格和意味接轨,以反对流行观点。一般认为,对小说进行“短篇”“中篇”或“长篇”的划分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兴起后的产物;在鲁迅等人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欧美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学作家艺术探索的主要方面的束缚。这往往让人们忽略20世纪以来中国短篇小说中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味道”及其书写经验——鲁迅明确指出自己的小说

■王怀义

创作有借鉴欧美小说,但我们读鲁迅小说仍能在直觉中感知到浓烈的“中国味道”,进而判定这是“中国小说”而不是“西方小说”。作者使用富有中国古典小说韵味的词汇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风格进行概括,创作观念的突破性转变,归纳和总结其呈现出的新的审美方式和审美价值。”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所谓“对短篇小说纵横比较的考察”包括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从纵”的方面,作者将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放在近现代以来中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比较,发现新时期短篇小说在主题呈现、技术转型、叙事模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特点;其二,“从横”的方面,作者将新时期短篇小说与同时期的长、中篇小说进行比较,发现其在体裁观念、语体特征和文体风格等方面的独特性,揭示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实验性和探索性特点。此外还可发现,作者甚至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进行比较,发现前者所具有的“中国”特点。例如,在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风格的生成与突破的分析中,作者将其风格呈现归纳为“纯净”“精致”“潜细”“绵远”四个方面,力求将其之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呈现的审美风格和意味接轨,以反对流行观点。一般认为,对小说进行“短篇”“中篇”或“长篇”的划分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兴起后的产物;在鲁迅等人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欧美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学作家艺术探索的主要方面的束缚。这往往让人们忽略20世纪以来中国短篇小说中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味道”及其书写经验——鲁迅明确指出自己的小说

显示,而是更注重对历史和命运的静静观照,注重理解与尊重,倾向同情与怀念”(第59页)。我们可将之称谓“观照式的主题呈现方式”。实富有中国古典小说韵味的词汇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风格进行概括,创作观念的突破性转变,归纳和总结其呈现出的新的审美方式和审美价值。”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所谓“对短篇小说纵横比较的考察”包括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从纵”的方面,作者将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放在近现代以来中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比较,发现新时期短篇小说在主题呈现、技术转型、叙事模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特点;其二,“从横”的方面,作者将新时期短篇小说与同时期的长、中篇小说进行比较,发现其在体裁观念、语体特征和文体风格等方面的独特性,揭示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实验性和探索性特点。此外还可发现,作者甚至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进行比较,发现前者所具有的“中国”特点。例如,在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风格的生成与突破的分析中,作者将其风格呈现归纳为“纯净”“精致”“潜细”“绵远”四个方面,力求将其之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呈现的审美风格和意味接轨,以反对流行观点。一般认为,对小说进行“短篇”“中篇”或“长篇”的划分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兴起后的产物;在鲁迅等人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欧美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学作家艺术探索的主要方面的束缚。这往往让人们忽略20世纪以来中国短篇小说中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味道”及其书写经验——鲁迅明确指出自己的小说

正是这个意义上,作者赋予新时期短篇小说这一文体鲜明的革命性意义,这也体现出作者反思性

黄山谷之道健。凤骨峻深,秀外映中,苍润疏秀,晚年诗作尤有禅趣理趣。有《杨均谷遗诗》八卷。1935年,世南读高小时,买到一本大达书局出版的《现代名人诗选》,其中就有杨增举一首《遣仆》:“苦忆相从过岭时,乱中抵死与扶持;还家欲以黄冠老,半载惊闻到处危;须信穷途吾已惯,却看行色泪先垂;灯前一笑焚《僮约》,他日重逢是旧知。”因为通俗又充满感情,所以早就背熟了。世南现今95岁了,80多年过去了,仍然历久不忘。谁知这么一个人,他竟会在袁世凯脚下出卖灵魂!他难道忘记了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我们江西古称文章节义之邦,可是这份江西推戴代表名单中,还有万载县人辛际周列名其上。辛际周自幼颖异,有神童之誉。12岁中秀才,18岁中举。废科举后,入京师大学堂学习经济学。毕业后,任江西省立第五师范(设于临江)学监,兼任省内某报主管。后丁父忧,回籍侍母。1925年,他40岁时,开始信佛吃斋,在县城巡察一些佛教信徒创建净业社。1930年迁居南昌。次年应聘执教于省立赣县中学。旋受厦门大学聘,任该校中文教授。1940年12月,参与筹建江西省省志馆。次年,担任该馆协纂。与吴宗慈总编《江西省古今政治地理沿革志》(江西省沿革志考略)。

世南素喜宋诗,杨增举、辛际周都是宗宋调的名家。因此,看到他们的名字,不禁慨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中国有个怨道,不以人废言。但也有另一句话:“如有周公之才美,使骈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骄,吝尚不可,况立身之大节乎!

总之,经过以上精华与糟粕的对比,为了中华的崛起,必须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从而大力推行民主与法治,使我们伟大祖国真正富强起来,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

文体如何是革命性的

郝敬波新著《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论稿》近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通过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创新的方位考察,揭示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意识之变化的某一侧面以及这一变化在文学中的反映。作者从新时期短篇小说文体观念的变革入手,对其主题呈现的独特性、形象塑造的内倾性、叙事模式的创新性、艺术语言的先锋性和艺术风格的突破性等进行了探索和概括,挖掘、整理了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创新中蕴含的新的审美意识内容,力求寻找新时期短篇小说在何种意义上是“中国的”这一问题之答案,亦即解释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具有的“中国经验”“中国味道”到底为何的问题。为此,作者屡屡用“新变”“反思”“独特性”“更新”“转换”“个性化”“先锋性”“突破”等带有变革意味的词汇讨论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和审美取向问题。

实际上,文体研究先天带有变革性或革命性特征。从刘勰《文心雕龙》开始至今,人们往往将文体之变看成社会之变的典型表征。刘勰所谓“文变染乎世情”中“文变”主要即指文体的变革,揭示了这种变革与“世情”之间的关系。但“文变”并非“世变”的机械对应物。在某些情况下,文体之变也能引起社会之变。在“世情”巨变的时代,人们既可以使用古老的文体,“旧瓶装新酒”,“以古喻今”,借旧文体传达新的社会意识,进而促进社会发生变化或变革;学者也可通过对某些特定文体的重新阐释和研究,传达新的思想观念,进而引起社会的某种变化或变革。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文体的变革性或革命性特点

会呈现得更直观。上世纪初,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胡适之《文学改良论》等论著就是以文体革命实现社会革命的经典之作。与此相关,小说和戏曲的创作和研究在当时也引起人们的重视,究其实也带有文体革命的意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鲁迅对小说——这一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备受压抑的文体进行历史研究,扭转历来文学史研究有意无意忽略小说研究的局面,其革命性不言而喻。王国维对宋元戏曲意境美的界定具有时代性或革命性;他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对中国传统的诗、词、曲等文体的审美特点进行界定,表达的正是时代的心声。文体的变革和研究由此成为传达时代心声、启迪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包括这样两个层面: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可以更新文学创作的内容,是文体产生新变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文学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新的变化也会做出最为灵敏的反映,新的文体会在这种反映中孕育而生,促进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而对“世变”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文变”既是社会现实和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产物,也是这种变化的有力推动者。从文体入手,探讨社会文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成为文体研究课题中应有之义。

以此反观本书论述则可发现,作者正是在变革性或革命性的意义上使用“文体”这一概念的,然后展开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这一独特文体的研究。为了呈现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创新以及这种创新所体现的思想新变,作者首先在方法论方面做